

第五章 結論

自民國初年起，中國因為長年戰亂及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，使得許多地方形成割據現象。北伐使掌控中央的國民政府地位加強，為追求實質的政權統一，中央積極接收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的勢力範圍，結果引爆中原大戰。在中原大戰之前，閻錫山長期據守山西，政治性格保守，於「自保」前提下，傾向依附當權者，以保持地方獨立。但參與北伐後，閻的勢力範圍急遽擴張，廣及冀、察、晉、綏、平、津等地，深為中央所忌。閻為鞏固勢力範圍，沒有太多避戰空間，參與了反蔣（中央）集團，也可想見當時中央與地方的緊張對峙情勢。

閻雖然參與中原大戰，卻曉得步步為營道理，戰局形勢終於在張學良發表「擁護中央」聲明後，有了關鍵性改變。先前閻原本擬分平、津予張，換取張的支持，並密切注意蔣、張關係是否隨時生變，隨著蔣、張合作的逐漸底定，閻為了預留後路，拒絕硬拼，寧以離晉下野來避免軍事衝突，好保全山西與晉綏軍隊，閻並且於離晉前佈置親信，準備伺機返晉，隨時等待東山再起機會。

中原大戰結束後，中央與地方仍舊呈現分立狀態，但衝突形勢已較緩和。在蔣的抵制與為難下，閻自知和平返晉殊不可能，而且越拖延對其往後繼續統治山西將會越加不利，所以閻利用西南反蔣聲勢機會又重新返晉。正如所料，蔣再度逼閻離開，閻了解此次的返晉如果沒有成功重掌政權，政治生涯或許結束，故一方面拖延離晉時機，另一方面則在等待中央與西南政府決裂，擬以反蔣陣營作為政治依靠。九一八事變爆發後，中央為追求一個穩定、統一的國內環境，促成寧粵和平談判，九一八事變竟成為閻政治前途轉變的契機，也因此

證明閻真是個懂得利用形勢穩固自身之人。

「寧粵合作」表面上以政治方式使中國復歸一統，但實際內涵是容許西南政府繼續分立存在，反蔣集團期待藉此拉蔣下野，閻與中央關係未轉和緩前一度也是依附粵方，但閻認為要求蔣下野恐非易事，且此時中國迫切需要禦日，「合作」應較為可行，故閻利用寧、粵兩方想合作卻又互相防範的矛盾，一方佯示與粵合作，另一方卻又對中央表示中立，周旋寧、粵之間，果然「鸚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」，閻趁此與汪兆銘內外呼應，以敏銳觀察與高明政治手腕順利回任太原綏靖主任。

閻回任後的第一件事便是穩固山西軍政大權，雖然中央接管晉綏軍隊時間不久，加上閻離晉前已部署得宜，但山西仍存在嚴重客軍問題，使閻在政治、軍事與財政上都顯得頗為制肘，尤其宋哲元部傾向中央更讓閻不安。閻為避免中央質疑其動作太多，因此僅能漸進地調動客軍離晉，直至日軍進犯熱河，閻再次抓緊時機，與中央提出類似協議的方式，用晉軍抗日的條件交換宋部離晉的要求，結果閻與中央在山西的軍事角力戰由閻勝出。

有了山西與晉軍這個有力後盾，閻比以往更致力於「保境安民」政策，作為穩固政權的根基。但隨即日本的侵略加劇，國內抗日呼聲不斷，民國22年5月馮玉祥在察哈爾宣布舉兵抗日，這位閻在中原大戰時的戰友，積極拉攏閻加入，再次考驗閻的反蔣抗日意願。只是此時整個國家情勢與閻的處境都已有重大改變，閻不再是當年廣佔華北勢力範圍的總司令，為免激怒日本，甚至因此波及華北、山西等地，閻拒絕馮，力勸馮和平解決，勿把事情擴大。閻也了解到，中央因為閻、馮素有交情，正密切注意山西動態，惟恐中央藉機進兵山西，閻有意斡旋和平談判，其實閻的不響應，已使察省抗日失敗了一半。

自從中原大戰挫敗後，閻顯得更為小心處理他與中央之間的關係，尤其與中央又有共同的敵人—日本，所以大體而言對中央決策頗為配合。以華北自治事件為例，閻就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影響力，不僅拒絕日本的利用，並為了向外營造中國統一的氣象，閻參與國民黨五全代會，使蔣不免稱讚此次順利解除華北自治危機，和閻立場肯定有關。而且華北自治運動的失敗，使中國在抗日、

反日的氣氛下趨向統一，幫助了閻與中央的關係獲得很大改善。¹

民國25年後，中國情勢越加複雜，中共決定由陝北渡河入晉，閻為保全山西，無法繼續堅持其「門羅主義」，遂請求中央軍入晉協助剿共，雖然順利驅共，卻因此引發「山西中央化」危機，打亂閻一向遵行的等距方針政策。為爭取與中央勢力的抗衡，閻改變其對中共的立場，由對立轉向妥協共存，所以徐永昌才在日記中說：「閻、蔣可以合作禦外，但談不到合作圖強，閻私而忘公，要他忘記虛榮，顧及國家存亡，太難了。」²

另一方面，日本因為受到中央軍入晉的刺激，加速對綏遠進行攻擊，閻為響應全國抗日呼聲，以及恐怕不抵抗的結果將導致綏遠、山西相繼受日本佔領，甚至掀起全面的中、日戰爭，所以發表「守土抗戰」原則，靜觀日本態度。閻還為了團結山西境內抗日力量，運用中共組織「犧牲救國同盟會」，作為與中共往來的管道，證明閻為了強化山西抗日力量，「聯共反日」思想漸趨成形。

與此同時，西南兩廣因感受中央「剿共安內」可能對其造成的危機，發動了「反蔣抗日」事變，雖然閻也有希望蔣下野的心意，但閻本身因有綏遠戰役、中共問題及中央軍在晉的困擾，加上華北、雲南、湖南等地已相繼宣布不響應，閻轉而勸阻兩廣息爭。民國25年9月兩廣事變結束，中央軍順利開駐兩廣，相較於閻在中央軍入駐的威脅下，選擇妥協並引中共制衡，閻的手段似乎較兩廣圓融。

閻傾向「聯共反日」，但卻不是無條件的支持。西安事變發生時，閻面對國人對西安事變譴責多於響應的情勢，認為挾持蔣恐怕只會造成內亂更為嚴重，日本甚至可能趁此機會攻打中國，所以閻接受中央授權，答應與張學良進行協調。雖然閻最後沒有斡旋成功，但閻的地位已受中央肯定，並可再次證明

¹ 自寧粵合作後，閻錫山與中央關係持續好轉，且華北自治事件中閻擁護中央的態度，更受中央大大讚賞，但根據《徐永昌日記》記述，閻似乎有意利用兩廣事件盼蔣下野，可見閻雖有擁護中央一致抗日之立場，但並不如曾景宗於〈九一八事變後閻錫山擁蔣統一立場—對閻錫山與蔣介石關係的一段側面觀察〉中所言，自九一八事變後，閻已經形成「擁蔣統一」立場。資料引自：徐永昌，《徐永昌日記》第三冊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1年），頁440。曾景宗，〈九一八事變後閻錫山擁蔣統一立場—對閻錫山與蔣介石關係的一段側面觀察〉，《山西師大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第21卷第4期（山西，1994年10月），頁39-46。

² 徐永昌，《徐永昌日記》第三冊，頁405。

閻是一個思慮周密，並會隨情勢而改變立場之人。

大體而言，抗戰前閻除了持續鞏固其在山西的根本勢力外，對政局也頗具影響力。尤其爲了山西利益，不時周旋於南京中央、中共、日本及其他地方實力派之間，但閻始終未能抵擋住戰前中國政權集中化趨勢。首先是剿共幫助南京中央得以深入較偏遠的西北、西南地區，包括山西、陝西、四川、貴州在內，即因剿共因素而有中央軍入駐，加速其中央化。然後「統一抗日」的號召力量，使許多地方實力派者，如：湖南何鍵、雲南龍雲、華北宋哲元等人，也願意因應時勢統由南京中央領導抗日。即便從民國初年就一直維持割據局面的西南粵桂，也在兩廣事件後被南京政府中央化。之後觀察國人對西安事變的反應，譴責多於贊同，可見即使當時中國尙未形式上完全統一，但以蔣中正爲首的南京中央，卻無疑的被視爲領導中國抗日的唯一象徵，證明中國在精神上已形成統一領導中心，至於所謂的地方實力派，實力經過戰前南京中央的削弱，雖在抗戰期間仍能發揮指導地方抗日禦侮的作用，但就軍事或政治力量而言，已無法發揮其在民國初期那種割據一方，甚至問鼎中原的氣勢與氣魄。